

营商环境生态如何提升 民营企业 PPP 项目参与度

——基于 260 个城市的 fsQCA 研究

侯文华,尹清弘

(重庆大学 管理科学与房地产学院,重庆 400044)

摘要:基于整体论的组态视角,以我国 260 个城市作为样本,采用 fsQCA 方法探究营商环境提升民营企业 PPP 项目参与度的驱动路径,并分地区探究样本空间情境差异。研究发现:单个营商环境因素并不构成实现民企 PPP 高参与度的必要条件,但良好的金融服务与创新环境为高参与度的实现发挥了积极作用;金融驱动型、市场助力型与政府主导型三类影响路径可有效产生高参与度。完善公共服务对东部城市民企 PPP 参与度的提高具有更普适的作用,而中西部城市通过发挥政府市场联动机制或优化金融服务可以提高民企 PPP 参与度。

关键词:民营企业;营商环境;PPP 项目;fsQCA

DOI:10.13956/j.ss.1001-8409.2025.03.16

中图分类号:F283;F276.5;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25)03-0121-07

How can Business Environment Ecology Enhance the Participation of Private Enterprises in PPP Projects Evidence from 260 Cities Using fsQCA

HOU Wen-hua, YIN Qing-hong

(School of Management Science and Real Estate,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Abstract: Based on the holistic grouping perspective, the fsQCA method is used to explore the driving path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to enhance the participation of private enterprises in PPP projects using 260 cities in China as samples, and the differences in the spatial context of the samples are explored by reg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dividual business environment factors do not constitute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for achieving high private enterprise participation in PPP Projects, but good financial services and innovation environment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achieving high participation; three types of influence paths, namely, finance-driven, market-assisted and government-led, can effectively generate high participation. Improvement of public services has a more universal effect on the participation of private enterprises in PPP in eastern cities, while the participation of private enterprises in PPP in central and western cities can be improved by playing the government-market linkage mechanism or optimizing financial services.

Key words: private enterprise; business environment; PPP project; fsQCA

引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健全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体制机制,拓宽多元化投融资渠道,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民营企业在内的各类经营主体公平开放,深入破除市场准入壁垒,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在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过程中,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PP)成为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重要机制,而民营资本参与的积极性

是 PPP 模式成败的关键^[1]。但过往我国 PPP 实践中国有企业常作为社会资本角色参与,对民间投资形成了一定的挤出效应,自 2015 年以来民企参与 PPP 项目的份额一直呈下降趋势,至 2022 年民企中标的 PPP 项目规模和数量占比仅为 3.5% 和 18.4%^①。这与 PPP 模式撬动民间资本、利用民企先进生产经营技术降低项目风险、优化总体收益的初衷背道而驰^[2,3]。

为坚持初衷、回归本源,发改委、财政部于 2023 年

收稿日期:2024-03-12

基金项目:重庆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项目(2022CDJSKJC19)

作者简介:侯文华(1977—),女,黑龙江双城人,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项目投融资(通讯作者);尹清弘(2001—),男,河南南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项目投融资。

① 明树数据. 2022 年中国 PPP 市场年报[EB/OL]. <https://bridata.com/report/detail?id=10138>.

11月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的指导意见》,明确强调PPP项目要优先选择民营企业参与,最大程度地发挥民间资本作用。而营商环境作为民营企业赖以生存发展的外部环境与其投资活动息息相关^[4],因此国家有关部门高度重视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吸引民营企业参与PPP项目。作为PPP模式的战略推进者,发改委明确表示我国推行PPP模式旨在创新投融资机制,推动多种投资主体的相互融合与优势互补,应当支持地方政府关注民间投资重点领域,以市场主体满意度为导向不断规范和完善中国营商环境评价机制,各地要不断营造有利于民间资本投资健康发展的良好环境,鼓励和吸引更多民间资本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建设,持续稳定地发展基础设施公用事业。

综上,如何优化城市营商环境吸引民营企业参与PPP项目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积极探索提升民企PPP投资热情的驱动路径不仅有助于解决项目建设的资金缺口,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形成PPP资金增量的长效机制,还可以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回归PPP模式设计的出发点,持续稳定地发展基础设施公用事业。但目前研究多聚焦于营商环境中单个要素对民企参与PPP的影响,较少关注营商环境生态对民企参与PPP投资的复杂驱动路径。鉴于民企PPP投资决策是营商系统内各要素交互作用的产物,有必要从整体组态视角研究营商环境生态对于民企PPP项目参与度的驱动机制。

因此本文基于组态视角,以我国260个城市作为研究样本,运用fsQCA方法识别营商环境生态影响民企PPP项目参与度的驱动路径。本文拟解决以下科学问题:(1)营商环境各要素中是否存在产生民企高参与度的必要条件?(2)营商环境中的哪些要素在产生民企高参与度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3)何种营商环境生态能充分产生民企高参与度?(4)东部与中西部产生民企高参与度的营商环境组态是否相同?本文的边际贡献如下:(1)立足整体观采用fsQCA方法研究城市营商环境生态中各要素联动匹配产生民营企业PPP项目高参与度的组态配置路径,突出营商要素组合效应对民营企业投资决策的综合影响;(2)通过组态空间情境差异对比东部与中西部城市民企PPP高参与度的不同组态,从顶层设计角度精细化探索不同地区城市营商条件对民企参与PPP的差异化影响,为各城市根据自身条件精准施策提供参考。

1 理论基础与研究框架

1.1 理论基础

1.1.1 营商环境与民企PPP参与度

营商环境是一个地区经济软实力的体现,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民间主体的营商环境建设,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特别强调营商环境在促进经济主体投资方面的重要作用,同时大量研究表明良好的营商环境是吸引社会资本参与PPP项目的关键^[5]。在企业环境理论下,环境的复杂性、动态性和敌对性都会影响到公司的经营

绩效,进而影响企业的决策行为^[6]。改善营商环境可以促进企业的投资活动^[7],对经济主体的发展活力^[8]和投资区位的选择都有着重要影响^[4]。因此政府需要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引导民企参与到PPP项目中来^[9]。

1.1.2 营商环境各要素对民企PPP参与度的影响

已有研究为进一步探讨营商环境生态与民企PPP参与度之间的协同影响和作用机制提供了理论支撑,本节为组态视角界定营商环境要素的条件范围,并梳理单个营商环境要素与民企PPP参与度之间的关系。

(1)公共服务:城市基础设施和服务水平是企业投资选址考虑的重要因素^[4]。高水平的公共服务通常意味着基础设施完善、管理效率高,这种环境有利于民企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投资PPP项目^[10],因为他们能依靠现有可靠的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降低运营成本和风险。优质的公共服务也会吸引更多的市民和企业前来投资和生活^[11],增加PPP项目的需求和潜在收益,为民企投资PPP项目带来更多回报。

(2)人力资源:高水平的人力资源环境通常意味着劳动力素质高、人才储备充足、技术和管理人才相对集中,这种环境下民企更易获得高素质的员工和专业人才,有利于PPP项目的规划、实施和管理,从而增加民企投资PPP的信心^[12]。城市较高的受教育水平与民企参与PPP意愿显著正相关^[10],此时民企能够更快适应项目的需求,进而提高执行效率,因此高水平的人力资源环境能吸引更多民企投资参与PPP项目。

(3)市场环境:市场作为“无形之手”是配置资源的重要手段,完善的市场环境蕴含丰富的生产资源,会对企业投资区位的选择产生重大影响,自由开放的市场环境使得市场进入成本更低,不仅能增加非国有经济的比重,还能提高市场信息的透明度与中介服务水平^[13],进而提高市场主体活力与资源获取效率,促进民企在PPP项目中的参与^[14]。而不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产生的隐性壁垒会导致国企对民企的挤占效应^[1],削弱民企参与PPP的积极性。

(4)创新环境:良好的创新环境有助于推动企业人才、知识、技术、设备等要素的协同创新。民企通常具有更强的创新能力和灵活性,政府可以通过PPP模式借助民间企业技术和管理优势推动项目的技术和管理创新。先进科技创新水平营造的良好环境为PPP项目提供了更多的技术支持和创新动力^[15],从而向富有创新精神的民企传递出积极信号^[10],使得他们更愿意参与PPP投资。

(5)金融服务:充足、高效、稳定的金融服务能够为民企针对性地提供多样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以满足不同类型PPP项目的资金需求,降低其参与PPP项目的融资成本和财务风险,缓解民企参与PPP项目时的融资约束^[14],增加民企投资的灵活性和选择性,提高他们进入PPP项目的热情^[10]。

(6)法治环境:健全、透明、稳定的法治环境能为民企投资PPP项目提供法律保障和预期稳定性,增强其投

资信心,清晰的法律法规能降低企业参与 PPP 项目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减少法律纠纷的可能性^[16]。此外,法律环境的完善还能为企业提供明确的产权保护^[17],确保其在 PPP 项目中的权益得到有效保障。

(7)政务环境:作为“有形之手”的政府是营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帮助之手”下,良好的政务环境可以提供透明、高效的行政服务,简化审批流程,降低准入门槛,减少寻租负面影响,在民营企业参与 PPP 项目时塑造良好的政企关系^[6],为其创造更有利的投资环境。相反,在“掠夺之手”下,会存在行政审批繁琐、信息不透明、政策执行不确定、行政腐败等问题,可能会使民企望而却步,影响其参与 PPP 投资的意愿^[18]。

1.2 研究框架

目前学界普遍关注营商环境这一宏观整体概念或是营商环境系统中单个要素对民企参与 PPP 投资的影响,单纯开展边际“净效应”的线性量化研究无法全面刻画营商环境构成要素的互动模式,很容易掩盖影响机理的

本质,因而不足以契合民企 PPP 参与度的驱动模式研究。

在交易成本视角的基础上,李志军等^[4]较为创新地采用生态系统视角对我国各城市营商环境进行综合评估。生态系统论起源于生物学领域,该视角下的营商环境指企业在进行投融资等活动时所处的综合性外部生态系统,包括企业所面临的资源条件和环境状况,此时营商环境的重要性体现为宏观外部环境因素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相互关联对企业的影响^[19]。从该视角出发,营商环境各构成要素并不是孤立存在,而是联动发展的,不同要素在相互影响的过程中实现协同演化,更符合客观现实^[4]。而民企参与 PPP 投资决策根植于特定城市环境中,属于复杂多重因素并发、交互作用的过程,在营商环境生态情境下能够产生影响民企 PPP 参与度的多条等效路径,因此当前尚需进一步研究营商环境生态中各要素如何共同影响民企 PPP 参与度。本文基于组态视角揭示营商环境生态对民企 PPP 参与度的复杂驱动路径,研究框架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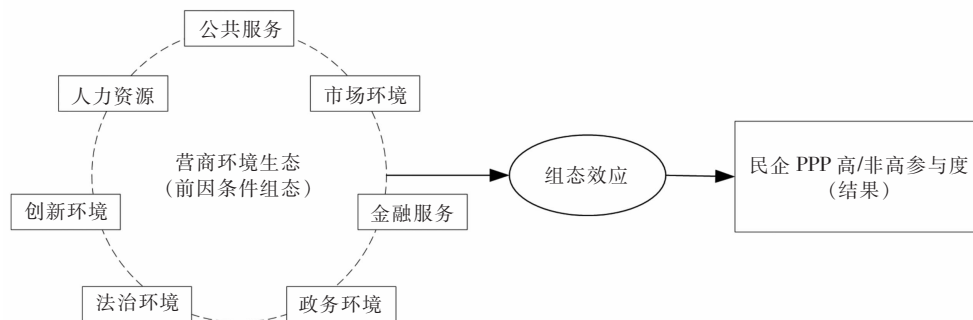


图1 营商环境生态对民企PPP参与度的组态效应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构建

2.1 研究方法

必要与充分关系是两种新兴因果逻辑解释范式,前者指前因条件的缺失必然导致结果不会发生,而后者指单个或多个前因条件能充分产生相应结果,对于这两种关系的论证,主流做法是基于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的组态技术^[19,20]。QCA不仅能识别必要关系,还可以构建多重组合从全局逻辑揭示结果变量的原因导向和条件组态,其中fsQCA能进一步处理部分类属问题,利用该方法构建与分析营商环境的条件组态具有情景适应性和视角创新性。因此本文着重以fsQCA充分条件组态分析探寻营商环境如何影响民企PPP参与度,解决了传统研究不能处理的多重条件并发的非线性关系,丰富了营商环境与民营企业投资的实证研究工具箱。

2.2 数据构建

2.2.1 数据采集与测量

(1)结果变量:民营企业在PPP项目中的投资规模可以充分反映其参与的意愿与积极性^[1,21],故本文采用各城市PPP项目中民企投资的金额来测量民企PPP参

与度。2019年财政部强调规范的PPP项目应当按规定纳入全国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库,及时充分披露项目信息^①。考虑到前因条件发挥作用的时间效应^[22],根据财政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中心(CPPPC)项目数据库中项目公司成立时间在2019—2022年的项目所在城市和股东信息来对各城市民企PPP参与度进行衡量。具体而言,首先利用Python和手工操作对CPPPC数据库中信息完整的PPP项目数据进行整理,获得了包括PPP项目公司成立时间、所属地区、社会资本出资额等信息。其次参考沈言言等^[23]的做法利用采集到的社会资本名称将由自然人控股的社会资本统计为民企。最后根据各PPP项目所属地区对所有项目按城市进行汇总,得到各城市在研究期间内民企PPP投资额。

(2)前因条件:从《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获取2018年各城市在公共服务、人力资源、市场环境、创新环境、金融服务、法治环境和政务环境7个营商环境要素的评价指数^[4]。通过将前因条件与结果的数据匹配,剔除29个数据缺失城市,最终获得260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作为研究样本。

①财政部网站。财政部关于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规范发展的实施意见[EB/OL]. https://www.gov.cn/xinwen/2019-03/10/content_5372559.htm。

2.2.2 数据校准

基于已有研究采用直接校准法将完全隶属、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3个校准锚点分别设定为0.75、0.5和0.25,并将0.5隶属度加上0.001常数^[19,24]。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和校准结果如表1所示。

3 结果分析

3.1 必要条件分析

采用fsQCA4.1软件对校准后的数据进行必要条件分析,结果显示营商环境生态中各要素对结果的必要一

致性水平均不超过0.9,即不存在实现民企PPP高/非高参与度的必要条件。

3.2 组态分析

采用fsQCA4.1软件分别分析导致民企PPP高/非高参与度的组态。在进行组态充分性分析时设定案例频数阈值为1,原始一致性阈值为0.8,PRI一致性阈值为0.7^[25],将既在中间解也在简单解中出现的条件识别为该解的核心条件,将仅在中间解中出现的条件识别为边缘条件^[26],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表1 集合、校准和描述性统计

条件和结果	模糊集校准			描述性分析			
	完全隶属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民企参与度	16627.750	5259.000	181.500	12973.877	19802.601	0	149881.000
公共服务	8.519	5.055	3.095	7.927	9.31	0.408	73.078
人力资源	23.326	19.309	17.333	22.579	10.124	8.932	76.203
市场环境	12.768	8.103	5.287	10.844	9.660	0.278	65.228
创新环境	3.080	1.280	0.463	4.562	11.362	0	96.386
金融服务	3.929	2.144	1.158	4.682	9.401	0	100
法治环境	47.740	41.613	27.743	38.968	12.099	0.749	76.975
政务环境	25.210	19.191	14.930	21.786	12.200	2.218	98.076

表2 实现民企PPP高/非高参与度的营商组态

条件	民企PPP高参与度				民企PPP非高参与度
	S1	S2	S3	S4	NS1
公共服务		⊗	●	●	⊗
人力资源	●	●	●		●
市场环境	⊗	⊗	●	⊗	⊗
创新环境	●	●	●	●	⊗
金融服务	●	●	●	●	⊗
法治环境	⊗	⊗	●	●	⊗
政务环境	⊗		⊗	●	⊗
一致性	0.888	0.847	0.838	0.840	0.859
原始覆盖度	0.073	0.068	0.097	0.086	0.129
唯一覆盖度	0.009	0.008	0.052	0.042	0.129
总体一致性		0.804			0.859
总体覆盖度		0.188			0.129

注:●=核心条件存在;⊗=核心条件缺乏;●=边缘条件存在;⊗=边缘条件缺乏;下表同

3.2.1 产生民企PPP高参与度的营商环境生态

表2显示产生民企PPP高参与度的组态有4个。其中金融服务与创新环境在每条组态都有出现。这是因为企业良好的融资能力与技术水平都会助力其参与PPP项目投资^[27],而城市高效的金融服务水平能为民企减少融资过程中的资金与时间成本,活跃的创新环境能够助力民企充分发挥技术与管理优势,激发其参与动力。4条组态中金融服务在组态S1和S2中发挥重要作用,而通过对比创新环境发挥重要作用的S3和S4可以发现市场环境与政务环境在两条组态中表现不同作用。因此本文确定民企PPP高参与度组态命名的“锚”为营

商环境生态中的金融服务、政务环境与市场环境^[25,28],下面结合典型案例定性资料对产生的3类组态作进一步分析。

(1)组态S1和S2:金融驱动型。两条组态中高金融服务都起核心作用,不同在于两条组态在条件上(S1的非高政务环境与S2的非高公共服务)存在替代关系,并且公共服务与政务环境均与政府的行为相关。该类城市主要通过金融的驱动作用与人力资源和创新环境协同产生促进民企参与PPP投资的营商环境生态。从投入和产出角度来看,任何产出都需要一定水平的要素投入,民企PPP高参与度的提升离不开金融要素投入的支持。正是由于金融要素的投入,PPP项目全流程体系才能有效运转,从而利用创新环境充分优化人力资源配置,为参与PPP投资的民企注入资源活水。以湛江为典型案例,该市推出针对民营与小微企业的“政银担”专项贷款金融产品有效缓解了民企融资难题。同时该市作为广东第五人口大城市拥有充沛的人力资源,在科技成果数量、人均发明专利拥有量等创新指标上均处于省内非珠地区前列。良好的金融服务解决了民企的后顾之忧,丰富的人力资本与活跃的创新环境促进民企投资热情的提升,产生了吸引民企参与PPP投资的营商环境生态。

(2)组态S3:市场助力型。该类城市中有效市场主要通过丰富金融要素投入,充分利用成熟技术合理配置开发资源和供给服务,营造促进民企参与PPP投资的良好营商生态。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强调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通过促使公共产品、人力资本与金融资源等要素优化组合,通过调节作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对民企参与PPP项目投资形成有效推力作用。以该类组态的典型案例洛阳为例,该市作为共和国老工业基地

坚持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其主要发展方向,打造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一批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目前该市已形成 2 个千亿级、7 个百亿级产业集群,作为中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洛阳对区域人口的吸引力很强,通过着力打造更高水平的国家创新型城市,研发投入强度常年位居全省第一。同时通过优化项目建设审批管理,建立健全涉企行政处罚裁量标准,保障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着力打造自主便利的投资市场环境,符合提出的市场助力民企参与 PPP 投资的营商环境生态。

(3) 组态 S4:政府主导型。这类城市主要依托有为政府营造健全的创新与法治环境,完善公共服务配给,提升金融服务水准,打造促进民企参与 PPP 投资的营商环境生态。新结构经济学中的有为政府论强调政府通过加大公共投资保障金融资源与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不断完善政策与法规以规范各类主体行为,减轻负外部性的不利影响,对民企参与 PPP 项目投资形成有效拉力作用。以该类组态的典型案例阜阳市为例,为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阜阳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充分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创新理念和技术,整合政府部门、金融机构、社会机构相关数据资源,搭建综合金融服务平台。实现政府产业政策、金融机构信贷投向、企业融资需求等多方信息的快速传递和即时交换,有效连接企业需求和金融资源供给。该平台还畅通了政府、银行和企业之间的对接渠道,加强政府部门、司法部门和银行机构之间的协同合作和信息共享。这反映出该市在政府主导下,通

过与金融、创新与法治等要素的有效配合驱动民企参与 PPP 投资的营商生态。

3.2.2 产生民企 PPP 非高参与度的营商环境生态

为验证因果非对称性,对导致民企 PPP 非高参与度的营商生态进行了分析,结果如表 2,组态 NS1 产生非高参与度,其中人力资源是唯一的核​​心存在条件,其他营商环境要素都为缺失状态。这说明单纯依靠充沛的人力资源并不能有效提升民企参与度。比较发现民企 PPP 非高参与度组态并不是高参与度组态的对立面,说明形成非高参与度与高参与度的驱动路径存在非对称性。

3.3 稳健性检验

本文对产生民企 PPP 高参与度的营商环境组态进行稳健性检验。通过微调案例频数(由 1 至 2)、原始一致性阈值(由 0.8 至 0.83)和 PRI 一致性阈值(由 0.7 至 0.73),对比发现覆盖度和一致性参数的变化不大,且产生的结果与表 2 间存在相同或子集合关系,证明结果比较稳健^[19,25]。

3.4 组态空间情境差异分析

由于我国各地城市在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制度环境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影响不同地区民企参与 PPP 投资的营商环境生态可能也各有不同。为验证该问题,按照国家统计局标准将前文 260 个城市划分为东部城市(87 个)与中西部城市(173 个)两组,对比分析东部与中西部城市民企 PPP 高参与度的不同组态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不同地区民企 PPP 高参与度的营商组态

条件	东部城市			中西部城市				
	E1a	E1b	E2	F1	F2a	F2b	F3a	F3b
公共服务	●	●	●	●	●	⊗	⊗	⊗
人力资源	⊗	●	●	⊗	●	⊗	⊗	●
市场环境	⊗		●	⊗	⊗	⊗	●	●
创新环境	⊗	●	●	⊗	●	●	⊗	●
金融服务	⊗	●	●	●	●	●	⊗	⊗
法治环境	⊗	⊗	●	⊗	●	●	⊗	●
政务环境		●	⊗	⊗	●	⊗	●	●
一致性	0.835	0.843	0.926	0.961	0.930	0.972	0.873	0.869
原始覆盖度	0.133	0.168	0.154	0.072	0.073	0.079	0.085	0.048
唯一覆盖度	0.078	0.085	0.080	0.035	0.042	0.037	0.059	0.021
总体一致性		0.840				0.902		
总体覆盖度		0.332				0.247		

东部地区拥有更多的财政资源用于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建设,同时具有人才和产业集聚效应,能吸引更多相关领域的高水平人才聚集,为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提升提供更好支持^[29]。因此东部城市在实现高参与度上呈现出 3 种组态,其中 E1a 和 E1b 的核心条件相同,构成二阶等价组态^[24],这两条组态揭示了东部城市提升民企 PPP 参与度的第一类路径,即高水平的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能弥补地方法治环境的不足,进而提高民企参与度。组态 E2 说明政府积极有为作用

欠佳的背景下,部分东部城市可以依靠活跃的市场环境与充沛的物力、人力资源与金融服务水平作为驱动条件,依靠高水平的创新环境和法治环境作为辅助来提高民企参与度。总体来看,东部城市实现高参与度的 3 条组态路径(E1a、E1b、E2)中公共服务作为核心条件发挥着积极作用,即使有些城市政务环境方面存在不足,但也可以凭借完善的基础设施、充沛的人力资源与活跃的市场金融环境来弥补政务短板,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E2)。

相较东部而言,中西部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较为欠缺,市场环境尚需改善。受地缘因素影响,该类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与受益性普及相对滞后^[29],在民企参与PPP投资所需的基建投入方面,中西部城市与东部城市存在明显的差距。中西部城市实现高参与度存在5条组态,组态F1说明在市场与政府均未发挥主体作用的情形下,部分中西部城市主要通过金融要素投入,通过不断完善公共服务实现高参与度。二阶等价组态F2a和F2b说明市场环境匮乏时良好的制度与创新环境拉力可以与金融要素共同作用弥补以上不足,从而提升民企参与度。二阶等价组态F3a和F3b显示,通过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可以弥补公共与金融服务水平的短板,实现民企PPP高参与度。总体来看,中西部城市实现高参与度的5条组态路径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组态(F1、F2a、F2b)表明在市场环境尚待完善的中西部城市,金融服务为提升民企参与度发挥了积极作用(F1),而创新与法治环境也可与金融服务发挥协同驱动作用(F2a、F2b)。第二类组态(F3a、F3b)表明对于基础设施与金融服务不佳的中西部城市可以通过构建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互融共生的营商环境优化原则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平衡关系^[30],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城市资源要素的劣势,实现民企PPP高参与度。

综上,在我国区域位置的不同通常意味着基础设施条件、市场开放水平和人才聚集等方面的显著差异,由此在实现高水平民企参与PPP投资的过程中产生了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城市差异化的营商环境组态。其中东部城市主要通过促进公共产品高质量供给来推动民企参与PPP投资,而中西部城市则强调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耦合作用和金融资源要素的投入作用来实现这一目标。由此为不同地区城市针对当地特点,制定差异化的策略提升民企PPP参与度提供参考借鉴。

4 结论与启示

本文较为特色地以我国260个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基于整体论的组态视角,采用fsQCA方法系统探讨营商环境生态对民企PPP参与度的影响,揭示促进民企参与PPP投资的多种营商组态路径,得到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单一营商环境条件并非产生民企PPP高参与度的必要条件,但良好的金融服务与创新环境为高参与度的实现发挥了积极作用。(2)共有三类营商环境路径驱动产生民企PPP高参与度,包括金融驱动型、市场助力型和政府主导型。(3)东部和中西部城市在实现民企PPP高参与度的驱动路径上存在明显差异。东部城市的三条组态路径均显示出公共服务作为核心条件发挥的普适作用。而中西部城市的五条路径显示出政府与市场间协同或是金融支持发挥了积极作用。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启示,为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制定精细化的营商环境优化策略提供参考:(1)各地应充分运用当地优势,在统筹整合各要素基础上重点推动关键要素的发展。例如对于金融与人力资源丰富的城市,应积极鼓励提供充足的金融支持,提升金融市

场活跃度和流动性,同时构建高水平人才队伍,为民企参与PPP项目提供必要的资金和人才支持;对于政务与法制健全的城市,可通过提高政府服务效率、提供透明高效的行政服务以及简化审批流程等措施加强民企参与PPP项目的法律保障,为企业提供明确的产权保护以弥补市场环境的不足,提升其投资信心。(2)不同地区城市应根据自身独特条件并结合所处地区营商环境要素的特点量身定制适合本地的提升策略。如中西部地区应避免公共服务不足的短板,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政府有为推动市场有效,充分实现金融资源合理有效配置,解决民营实体的融资难题,激发其在PPP投资过程中参与热情。而东部城市则应充分利用先天优势,利用高水平基础设施充分调动营商环境各资源环境要素,为民企积极参与PPP项目投资提供有效外部支持。

本文从城市层面考察营商环境提升民营企业PPP参与度的驱动路径,受限于数据可得性尚未深入到不同PPP行业,仍值得进一步探讨。同时各城市的民企参与度提升路径可能会随时间变动,对此尚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后续研究可考虑基于行业细分领域或是动态数据开展研究以更科学地探寻民企PPP参与度的提升策略。

参考文献:

- [1] 曾莉,罗双双. 我国PPP实践中民营企业参与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731个县域样本的实证分析[J]. 软科学,2020,34(2):33-38.
- [2] Chan A P C, Yeung J F Y, Yu C C P, et al. Empirical Study of Risk Assessment and Allocation of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rojects in China[J].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 Engineering, 2011, 27(3): 136-148.
- [3] Zhang S, Chan A P C, Feng Y, et al. Critical Review on PPP Research - A Search from the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Journal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 2016, 34(4): 597-612.
- [4] 李志军. 2020·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M].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21.
- [5] 王波,何寿奎,马维文.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保类PPP投资影响因素的空间分析[J]. 软科学,2024,38(1):45-52.
- [6] 龚军姣,张敏. 民营企业参与城市公用事业PPP项目的影响因素研究[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20(5):100-112.
- [7] 牛鹏,郑明波,郭继文. 营商环境如何影响企业投资[J]. 当代财经,2022(1):90-101.
- [8] 段永彪,董新宇. 电子政务、营商环境与城市经济活力——基于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 软科学,2023,37(12):15-22.
- [9] Wang Y L, Cui P, Liu J C. Analysis of the Risk-Sharing Ratio in PPP Projects Based on Government Minimum Revenue Guarante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 2018, 36(6): 899-909.
- [10] 时秀梅,孙梁. “一带一路”中私人部门参与PPP项目的影响因素研究[J]. 财经问题研究,2017(5):12-17.
- [11] Baum-Snow N, Pavan R. Understanding the City Size Wage Gap[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12, 79(1): 88-127.
- [12] 周正祥,张秀芳,张平. 新常态下PPP模式应用存在的问题及

- 对策[J]. 中国软科学, 2015(9): 82-95.
- [13] 王丽洋, 孙燕芳. 民营企业参与 PPP 项目的组态路径——基于 fsQCA 的实证研究[J]. 软科学, 2023, 37(7): 66-72.
- [14] Fleta - Asín J, Muñoz F. When Bigger is Better: Investment Volume Drivers in Infrastructure Public - Private Partnership Projects [J]. Socio - Economic Planning Sciences, 2023, 86.
- [15] Steijn B, Klijn E H, Edelenbos J.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 Added Value by Organizational Form or Management? [J].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11, 89(4): 1235-1252.
- [16] Fleta - Asín J, Muñoz F, Rosell - Martínez J. Public - Private Partnerships: Determinants of the Type of Governance Structure [J].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2020, 22(10): 1489-1514.
- [17] Bertelli A M. Public Goods, Private Partnerships,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J].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2019, 29(1): 67-83.
- [18] Wang H, Liu Y, Xiong W, et al. The Moderating Role of Governance Environmen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isk Allocation and Private Investment in PPP Markets: Evidence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 2019, 37(1): 117-130.
- [19] 杜运周, 刘秋辰, 程建青. 什么样的营商环境生态产生城市高创业活跃度? ——基于制度组态的分析[J]. 管理世界, 2020, 36(9): 141-155.
- [20] Dul J, van der Laan E, Kuik R. A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Test for Necessary Condition Analysis [J].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ethods, 2020, 23(2): 385-395.
- [21] 王雨辰, 胡轶俊. 民营企业 PPP 项目参与度研究——基于公共性的风险分析[J]. 软科学, 2019, 33(6): 89-94.
- [22] 敦帅, 毛军权. 营商环境如何驱动“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 ——基于组态视角的定性比较分析[J].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23, 25(2): 78-92.
- [23] 沈言言, 宗庆庆. 区位优势、PPP 项目社会资本参与和引资质量[J]. 财政研究, 2022(10): 46-59.
- [24] Fiss P. Building Better Causal Theories: A Fuzzy Set Approach to Typologies in Organization Research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1, 54.
- [25] 杜运周, 刘秋辰, 陈凯薇, 等. 营商环境生态、全要素生产率与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多元模式——基于复杂系统观的组态分析[J]. 管理世界, 2022, 38(9): 127-145.
- [26] 杜运周, 贾良定. 组态视角与定性比较分析(QCA): 管理学研究的一条新道路[J]. 管理世界, 2017(6): 155-167.
- [27] 刘穷志, 任静. 社会资本参与 PPP 模式的“素质”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J]. 经济与管理评论, 2017, 33(6): 38-46.
- [28] Furnari S, Crilly D, Misangyi V F, et al. Capturing Causal Complexity: Heuristics for Configurational Theorizing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20.
- [29] 宋佳莹, 郭璟.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测度: 可及性与受益性视角[J]. 统计与决策, 2024, 40(4): 91-95.
- [30] 宋林霖, 陈志超. 中国语境下的营商环境优化: 核心议题与治理路径[J]. 中国行政管理, 2021(1): 147-149.

(责任编辑: 秦 颖)